

序

陈衍德、杨权同志合著的《唐代盐政》完稿了，我很高兴有幸先读到它。全书分五章，从食盐的生产、盐法的变革到盐业的经营管理，分门别类加以论述，条理清晰，内容全面，史料丰富，并有一些新的见解。我相信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唐代盐的生产和流通、盐业生产关系诸问题。

盐是人们生活中一日不可缺少的食品，它与文明的兴起有着密切的联系。古代汉民族的发展一直和盐有密切的关系。传说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这三个都城都紧邻著名的河东盐池。因此国外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最古的文明，实兴起于河东盐池附近，盐乃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经济基础^{〔1〕}。此说虽过分强调盐的作用，但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说上古传说尚有待于证实的话，那么史书的记载却确凿无误地向我们展示出许多城镇的兴起确与盐有关。如今江苏盐城，早在西汉武帝时就于此处设置盐渎县。渎者，河也，其地百姓为运盐而开凿河渠，遂以此为县名，东晋安帝时，改称盐城，唐代这里是淮南产盐中心，曾盛极一时。又如今山西运城，古称潞村，为历代河东盐池管理机构驻地，元代正式筑城，因是盐运司所在地，故名运城。可见城市文明的兴起，确与盐密切相关。另外需要强调的是，盐作为最早的商品（因其无处不需，而产地又受限制），是商业文明兴起的原

〔1〕 宫崎市定：《历史与盐》，《宫崎市定论文集》下卷，218~230页。商务印务馆，1965年。

因之一，贾（gǔ商人）、鹽（gǔ池盐）同音，绝非偶然¹。因此，盐的交易与盐的生产一样，也是促进城市文明发展的因素之一。总之，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盐政作为“盐文化”的物质的、制度的体现，它实在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盐是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不可须臾离之。但是盐又不同于粮食，一般民众不可能做到就地生产。这一特点导致了盐的生产和消费无法统一，需要中间环节。封建政府因此介入，把盐税纳入财政收入轨道；商人的介入，把贩运食盐视为利藪。历代如此。

唐代盐法的变革，根源于社会经济水平，也和政治局势、财政状况有密切关系。作者在阐述唐后期实施盐的专卖制度原因时，即是从这个总观点出发的。

唐后期盐的生产、销售规模比以前扩大，盐的专卖收入在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因而盐政的管理也相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盐铁使的设立，就是影响政局的大事。人们还记得，王叔文出任度支、盐铁、转运副使之职后，因为杜佑仅为挂名正使，实权操在王叔文手中，叔文得以控制国赋，挟顺宗而令天下，实行改革。设置度支、盐铁、转运使后，唐财司向分理的方向发展，演变为三司制度。

更值得一提的是盐的营销方法在不断改革，除实行划界供应食盐外，据作者的看法，又有“引岸制”和“引钞盐制”的初步形态的出现，这两项制度对后世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

总之，本书综合了前人和近人的研究成果，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补缀史料，提出自己的见解，言之有据，值得肯定。关于本书的全面评价应由读者来进行，恕不代庖。

郑学檬 1988年6月

¹ 参见宫崎市定：《论贾的起源》，《东洋史研究》5卷4期，

第一章

唐代的盐业生产

第一节 食盐的种类、产区和产量

一、食盐的种类

在唐朝辽阔的疆域上，蕴藏着丰富的食盐资源。由于国计民生的需要，这些资源在当时有了一定规模的开发。据史籍记载，当时从沿海到内陆，从“中土”到“四夷”，都有食盐出产。

唐代出产的食盐种类繁多，如果依其形质划分，不下数十种。如：

印盐 “色红白，味甘，状如方印”^①。当时丰州、灵州用以充土贡，河东也产这种盐^②。

红桃盐 孟州怀远县有“红桃盐池，盐色似桃花”^③。

玉华盐 又名水精盐、君王盐。这是盐中上品，盐色晶莹洁白，辉映日光，状似琥珀^④。

青盐 夏州朔方县有盐池，其盐颗大，“有青白，青者名曰青盐，一名戎盐，入药分也”^⑤。

红盐 “恩州有盐场，出红盐，色如绛雪”^⑦。

① 《太平御览》卷八六五《饮食部二三》。

② 《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

③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四》。

④ 《北户录》。

此外，还有白盐、黑盐、紫盐、柔盐、駁盐、臭盐、伞子盐、马齿盐、荟霜盐、贡龙盐等等。

上述各种食盐，如果依产地划分，则有散、鹽、形、饴四大类。

什么是散盐、鹽盐、形盐、饴盐？《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载：后周太祖相西魏，创制六官，其中有一官职称为“掌盐”，职责是“掌四盐之政令”：“一曰散盐，煮海以成之；二曰鹽盐，引池以化之；三曰形盐，按地以出之；四曰饴盐，于戎以取之。”据此可知，所谓“散盐”，指的是海盐；“鹽盐”，指池盐；“形盐”，指井盐；“饴盐”，则是产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天然盐，也叫岩盐或石盐^①。

二、三大食盐产区概述

据《新唐书》记载，天下有盐之县共有一百零五个。但至于是哪一百零五个县，该书并未作具体记载，这个数字也未必齐备，而且在不同的时期，食盐的出产情况也会发生变化。不过这条史料毕竟说明了当时盐产分布之广。根据现有史料，当时食盐出产在地理上分为三大区：

（一）以江淮为主体的海盐产区

海盐是用海水或滨海地带的咸卤制取的食盐。唐时，在南起岭表，北至幽州的沿海五道地区都有海盐出产，而以江南道的“两浙盐”和淮南道、河南道的“两淮盐”最负盛名。

江南道东部居东海之滨，地会卤泻，自汉代以来，制盐世为恒业，民间有“烧铜山而煮海盐”^②的风习。到了唐代，这一带盐业更为繁荣，时称“铜盐材竹之货殖，舟车包筐之委输”、

唐贾公彦《周礼·盐人》疏云：“戎盐……即石盐是也。”

^②陈仲师《土风赋》，《全唐文》卷七一六。

“被四方而盈二都”^①。当时以钱塘江为界，江南为浙东，江北为浙西，地跨今江、浙两省。由浙东和浙西组成的两浙盐区，是该道同时也是全国最重要的食盐产区，素为官府所重。宝应（762—763）时刘晏领东南盐事，在产区设立四大转运场，两浙拥其三（湖州场、越州场，杭州场）；又设十大盐监，管理官盐生产，两浙亦占其半（嘉兴监在苏州，新亭监在杭州，兰亭监在越州，临平监在杭州、永嘉监在温州）^②。五监之中，以浙西的嘉兴监和临平监的生产规模最大，它们各自食盐的年产量仅次于年产六十万石的淮南扬州海陵监，而与岁煮四十五万石的楚州盐城监相当^③。除了此五监以外，两浙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产盐地，如明州的鄞县，台州的黄岩、宁海，杭州的盐官等^④。江南道另还有一个海盐小区，地在今福建一带，刘晏时设置有侯官监（在福州）加以管理。福州的长乐、长溪、连江，泉州的南安、晋江，俱有海盐出产^⑤。史籍对江南道大多数地方的海盐生产状况记录都很简略，往往只笼统地记载“有盐”或“有盐官”，至于规模如何则不详备。但根据当地的生产条件，盐亭或盐场应是不不少的，如晋江在北宋时析为晋江、惠安二县，晋江有盐亭一百六十一所，惠安有盐亭一百二十九所，据此推知唐朝时盐亭已为数不少了。

两淮盐区是与两浙盐区齐名的海盐产区。所谓“两淮盐”即淮南道出产的淮南盐和河南道出产的淮北盐的合称。两淮居黄海之滨，海盐资源十分丰富。早在西汉时吴王刘濞就曾差人在广陵

① 崔元翰：《判曹食堂壁记》，《全唐文》卷五二三。

② 《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

③ 《元和郡县图志》逸文卷下载：“（海陵）盐监，煮盐六十万石，而楚州盐城，浙江嘉兴、临平两监所出次焉。”

④ 《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五》。

煮盐，但自汉迄隋，生产沿革无闻于史，至唐代盐业才重振。淮南盐集中出产在扬州的海陵监和楚州的盐城监，二监都是刘晏主持盐政时设的。前者为唐朝最大的海盐监，岁煮盐六十万石；后者隶有五祐、紫庄、南八游、北八游、丁溪、竹子、新兴、七惠、四海九大产场，共有盐亭一百二十三所，岁煮盐四十五万石。淮北盐散布在河南道的淮北地区，泗州涟水场是刘晏设置的江淮四大转运场之一，地位重要，见诸史书的海盐产地有青州千乘，密州诸城，莱州胶水、昌阳、即墨，登州牟平^②。其中诸城县东南一百三十里滨海处“有卤泽九所，煮盐，今古多收其利”^③。

在唐朝疆域南端的岭南道和北端的河北道，也有海盐出产。岭南的盐产资源和生产条件都是一流的，盐业发源也较早，惟地处荒服，生产一直未能发展起来，在唐代亦只限于自给。如潮州海阴县盐亭驿，“百姓煮海水为盐，远近取给”^④。唐代史籍对岭南的记载尤其阙略，见于史籍的产盐地只有广州新会、潮州海阳、儋州义伦、琼州琼山、振州宁远。河北盐场产量有限，产盐地有棣州蒲台、渤海、蛤蜊，沧州清池、盐山、景城。

海盐产区是唐代最重要的食盐来源地，江淮盐利则是唐朝食盐专卖收入的大宗。

盐城监所辖场数在唐代史料中无直接记载，惟《太平寰宇记》卷一二四载：“盐城监，古之盐亭也，历代煎盐之所。元管九场，伪唐以为盐监。”“伪唐”即南唐，在此之前有九场，指的是唐朝时的状况。九场之名亦见于同处。

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一〇《河南道六》及《新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二》。

^② 《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一《河南道七》。

同上卷三四《岭南道一》。

（二）以河东两池为代表的池盐产区

池盐是利用内陆咸水湖泊池泽的卤水制取的食盐，它主要产于北方和西北地区。江淮沿海地区开发较晚，所以在唐代以前，池盐产区是最重要的食盐产区，朝议盐务多重西北而略东南。唐代海盐生产虽然已经后来居上，但池盐生产的地位仍不失其重要。唐代有经济价值的盐池究竟有多少，记载不一。唐人崔敖说：“盐池之数有九，七出幽朔，二陂河东。”^①宋人修《新唐书》，则称“唐有盐池十八”^②。但不提幽朔七池，如将幽朔七池包括在内，那么唐代的盐池至少在二十五处以上。这些盐池集中在河东、关内、陇右三道，而以河东道河中府的两池最为著名。

两池即地处今运城盆地之南，中条山北麓之解池和安邑池。解池在解县东十里，安邑池在安邑县南五里。二池水域相通，实际上是一池，所以两池往往通称为“解池”或“河东盐池”，两池盐在唐代则通称为“解盐”、“河东盐”。解池自东向西伸延，成长条状。唐时号称“幅员百里，澄澈万顷”^③，而据今日人实测，长约三十公里，宽约三至五公里，面积约一百三十平方公里。河东盐池在唐代是我国最大的内陆盐湖（唐以前和唐以后亦然）。科学勘查证明：远在新生代初期，由于喜马拉雅山构造运动的作用，在今中条山北麓发生了大面积的地层沉陷运动，使这个地方形成了原始湖泊的雏形，到新生代第四纪初，在新的地壳变化的作用下，中条山发生垂直升降运动，造成北麓断裂，形成狭长的陷落地带，含有大量盐份的洪水汇集到这里，经过长期沉

《大唐河东盐池灵庆公神祠碑》，《全唐文》卷六一四。

《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

崔敖《大唐河东盐池灵庆公神祠碑》，《全唐文》卷六一四。

淀、逐渐形成了天然盐池^①。优越的自然条件，使河东池盐无论是产量还是质量都成为了我国北方盐的代表。唐代在开元初年即组织屯丁开发此池^②。中间虽一度出租给“有力之家”营种，但后直接设置官吏管理此池的生产。据当处保存下来的唐代碑文记载，河东盐池在当时共有方集、常满、盐北、青鼻、盐宗、分云、柳谷、紫泉、下封、资国十场，年产量在八十万石左右（详见下文）。

除两池以外，河东道的盐池还有女盐池、董泽和晋兴泽。女盐池“在（解）县西北三里，东西二十五里，南北五里，盐味少苦，不及县东大池盐”^③。唐朝初年在幽州、大同军、横野军设置过生产池盐的盐屯^④。后两地在河东的云州和蔚州。

在关内道和陇右道，亦有盐池分布。

关内道的盐池主要在灵、盐二州。灵州回乐县有“温泉盐池，在县南一百八十三里，周回三十一里”^⑤；温池县“县侧有盐池”^⑥；怀远县有盐池三所：红桃盐池、武平盐池、河池盐池^⑦。另外还有回乐、两井、长尾、五泉、弘静五盐池^⑧，所在县不详。盐州池盐俱出产在州治五原县以北，共有盐池四所：乌池、白池、细项（一作“顶”）池、瓦窑池。乌、白二池在唐代

轻工业部制盐工业局勘探队：《山西运城盐池矿地质详探报告》。

《旧唐书》卷一八五《姜师度传》。

③《通典》卷一〇《食货典·盐铁》。

《金石萃编》卷一〇三。

⑤《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二《河东道一》。

⑥《通典》卷一〇《食货典十》。

⑦⑧《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关内道二》。

⑨《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四》，又见《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

⑩《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

仍出盐，其余两池已废^①。乌池在穆宗时敕令每年柴盐收榷博米，以十五万石为定额^②，估计生产有一定规模。此外，华州栎阳县有煮盐泽，“泽多咸卤，……周回二十里”^③；宥州长泽县有胡（一作“故”）洛盐池^④，大中时隶河北供军使，每年出盐约一万四千余石，供振武、天德两军及营田水运官健^⑤；会州会宁县有“因雨生盐”^⑥的河池；京兆府富平县有盐池泽^⑦；同州的朝邑、奉先二县亦有卤池^⑧。

陇右道产盐池自东至西有：秦州长道，凉州姑臧（武兴盐池、黛眉盐池），甘州张掖，肃州福禄、至门，沙州敦煌，伊州伊吾（咸池海）、纳职（陆盐池），西州交河^⑨。这一带气候干燥，池盐往往因池水自然蒸发而生，生产规模不大，如张掖盐池仅“周回一百步”^⑩，但盐质甘美。

（三）以两川为重心的井盐产区

井盐靠凿井取卤制成，产地与地质地貌有密切关系。地层中的咸质经地表或地下川流分解后渗入地下，即生盐卤，故唐代盐井主要集中于山脉绵亘、川流环曲的西南部，以剑南道两川——即剑南东川和剑南西川为最多。山南道、黔中道亦有不少盐井。唐朝曾经在西南地区设置剑南东川院、剑南西川院和山南西院三大巡院和被称为“峡内五监”的大昌盐监（在夔州）、富都盐监（在泸州）、云安盐监（在夔州）、涂谿盐监（在万州）、渔阳

①《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四》；又见《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

②《唐会要》卷八八；又见《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上》。

③《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关内道二》。

《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

④⑤⑥⑦⑧⑨ 《唐会要》卷八八。

⑩《元和郡县图志》卷四《陇右道下》。

盐监（在万州），管理西南地区的井盐产销事务^①。据《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记载，唐朝有盐井六百四十。日本早稻田大学古贺登先生在《续唐代井盐考——再论新唐书食货志中有关井盐的记载》指出，这个记载与杜佑《通典》卷一〇《食货典十》的记载相差甚大（《通典》载蜀道陵绵等十州共有井九十口），认为这是“新唐书根据自己当时的情况，即宋代情况类推所写成”的^②。其实盐井视盐泉水量、卤水浓淡而为兴废，井老即泉枯，数目并无一定。以下根据各种的井盐分布状况表列于下：

《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

古贺登：《续唐代井盐考——再论新唐书食货志四中有关井盐的记载》，《史观》第五十七、八册。

1、剑南道

州	县	有记载的井名	总井数
邛州	蒲江		1
	火井	火井	1
眉州			
嘉州			
简州	阳安	阳明井、牛鞞井	5
	平泉	上军井、下军井	
资州	内江		26
	银山		
	盘明		
	资阳		
	龙水		
潯州	昆明		
梓州	郪县		26
	通泉	赤车井	14
	盐亭	大汁井、小汁井、歌井、针井、	
	玄武		
	飞鸟		
	永泰		
	涪城		

据《通典》卷一〇《食货典》；《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一《剑南道上》，卷三二《剑南道中》，卷三三，《剑南道下》，《新唐书》卷四二《地理志六》。

续表

绵州	盐泉	阴下井	
	巴西		
	昌明		
	罗江		
	魏城		
遂州	方义		12
	蓬溪		13
普州	安岳		10
	普康		3
昌州			
荣州	应灵		4
	公井	大公井	11
	威远		7
	和义		5
	资官		
陵州	仁寿	陵井	
	贵平	平井	
	井研	井研井、思稜井、井鑊井	3
泸州	江安	可盛井	
	富义(世)	富义井	8
	绵水		

2. 山南道

州	县	有记载的井名	总井数
梁州	南充		
	西充		
	相如		
成州	长道		
阆州	阆中		
	晋安		
	新井		
	新政		
通州	宣汉		
开州	万岁		
合州			
归州	秭归		
	巴东		
渝州	巴县		
	璧山		
夔州	奉节		
	巫山		
	云安		

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二《山南道三》、同书逸文卷一，《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四》。

续表

万州	南浦		
忠州	临江		

3. 江南道^①

州	县	有记载的井名	总井数
潭州	湘乡		
黔州	彭水	左右盐泉	

除了上列三道的井盐产地以外，云南一带也出产井盐。具体情况见下表^②：

地名	有记载的井名	总井数
安宁城	石盐井	5
览贖城	郎井	
泸南		
车蛮、磨些蛮诸部		
剑寻	傍弥潜井、沙追井、若耶井、讳溺井	2
剑南	细诺邓井	
丽水城	罗苴井	

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九《江南道五》，卷三〇，《江南道六》。
据《蛮书》卷七《云南管内物产第七》。

在上列的众多盐井中，以陵州仁寿县的陵井规模最大，亦最为著名。《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三《剑南道下》，称此井“纵广三十丈，深八十余丈”，而《太平广记》卷三九九引唐朝《陵州图经》则记云：“陵州盐井……周回四丈，深五百四十尺。”唐末杜光庭的《道教灵验记》又说此井“直下五百七十尺”。不管哪一个记载更为准确，此井规模很大没有疑问。但就产量而言，剑南盐井，可能以泸州富义（义应为世，唐讳）盐井最大，元和时“月出盐三千六百六十石”。

唐时在局部地区，还出产岩盐，这种盐为远古海洋盐质矿变而成，不需制作，即为成品，但当时开发不多，产量极少，故不详述。

三、食盐产量

唐代海盐产量居三大盐类之首。池盐产量虽退居第二，但仍占相当比重。井盐与海盐、池盐相比，产量要少得多。

统计唐代各类食盐的产量以及全国的总产量不无困难。若以现存的盐利数额换算成食盐产量，会碰到两个问题：一是经营成本各地不同，因而每斗盐所获利润各地亦不同；二是各地都有部分食盐是供官府和军队消费，并未投入市场。但是，通过对盐利数额的分析，结合其它史料，仍可描绘出唐代食盐产量的大致轮廓。

唐代海盐生产盛况已见前述。当时淮南、两浙、福建、岭南已成为海盐产量最多的地区，其中又以淮南、两浙为最。《宋史·食货志》指出淮盐产量多于它处的原因，“盖以斥卤弥望，可以供煎煮，芦苇阜繁，可以备燔燎”。亦即海岸宽阔平缓，海盐资源丰富，又遍布芦苇草荡，燃料随处可取。唐代情况亦无二

《云笈七签》卷一一九。

《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三《剑南道下》。

致。

淮南道扬州海陵监的盐产量为全国之首，元和时年产六十万石，直至唐末五代产量仍很高。五代时南唐战败，将海陵监割让与后周，但每岁得以支取“赡军盐三十万石”^①，其时海陵监产量当不逊于唐中叶。楚州盐城监年产亦达四十五万石。此二监年产即达百万石以上。加上其它地方，淮南盐产总数当极为可观。

淮南还是海盐销售和转运的中心。开成年间，入唐求法的日本僧人圆仁亲眼看到从沿海产区至扬州的水路上，“盐官船积盐，或三四船，或四五船，双结续编，不绝数十里，相随而行，乍见难记”^②。从淮盐转运盛况亦可见其产量丰厚之一斑。

浙盐产量亦颇为可观，仅兰亭、嘉兴、临平三监的年产量即达百万石以上，堪与淮盐媲美。闽盐与广盐的产量虽远不如淮南、两浙，但作为新的海盐产区，两地的盐产量总的来说处于上升趋势。

唐代北方海盐生产虽落后于南方，但并非一蹶不振。北方沿海的盐业生产仍能满足本地需要，间或还有外运。咸通十年（869）幽州节度使张允伸“进助军米五十万石，盐二万石”^③，支持正在镇压庞勋起义的唐朝军队，可证北方海盐产量尚不致太低。

唐代海盐产量的变动大致成马鞍形，以大历末为最高峰，在此之前是上升趋势，在此之后呈下降趋势。史载永泰元年（765）海盐之利为六十万贯，大历十四年（779）增至六百万贯。十五年中增长十倍。此间官订盐价并未上涨，保持在每斗一百一十文的水平。应该说，盐产量大致亦有相应增长。元和三年（808）

《十国春秋》卷一六《南唐二·元宗本纪》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

《旧唐书》卷一八〇《张允伸传》。

海盐之利增为七百二十七万余贯，但此时官订盐价为二百五十文，扣除涨价因素，盐产量实有减无增，此后直至唐末，海盐之利均未超过上述水平（参见第四章第三节）。

唐朝境内各处盐池，首先要说到河东两池，两池历史悠久，但唐初产量却不高，开元年间始有起色。大历末，两池盐利为八十万贯，其产量可能达到高峰。元和初，增至一百六十万贯。因盐价增加一倍有余，故其实际产量有减无增。此后两池盐利继续呈下降趋势，只在大中时略有回升。其他盐池的产量，远不如两池，估计多者数万石，少者数千石而已（参见第四章第三节）。

井盐产量历来比较海盐、池盐为低。唐代尚未发明卓筒井，井盐产量还是很有限的。唐代史籍未见有关井盐产销的较为完整的记载，恐怕也是其产量低微的缘故。零星的记载，如《元和郡县志》卷三三载，泸州富义县有盐井“月出盐三千六百六十石，剑南盐井，唯此为大”，可知该井年产量达四万三千九百余石。据《宋史·食货志》载，宋初益、梓、利、夔四路井盐总销售量为三十二万三百余石，唐代井盐总产量当不会高于此数。

假如除了收购成本外不考虑其它经营成本，也不考虑未投入市场而直接进入消费的部分食盐，则按大历末盐利数额推算，海盐年产量约为六百万石。我们是用大历末海盐利润总额六百万贯除以每斗的利润一百文（每斗盐价一百一十文扣除收购成本十文），得到当年海盐总产量六百万石。池盐同此。井盐为估计数。但严格而言，这里未考虑的因素还有藩镇控制的盐业生产，以及通过走私而流失的食盐，估计上述数字可能不致过份偏离实际产量。

第二节 三类食盐的产制技术

一、海盐的产制

我国古代的劳动人民很早就掌握了从海水中提炼食盐的技